

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报告书

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报告书

1999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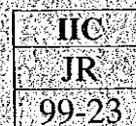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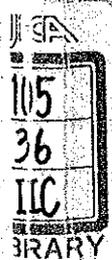
JICA LIBRARY



J 1152749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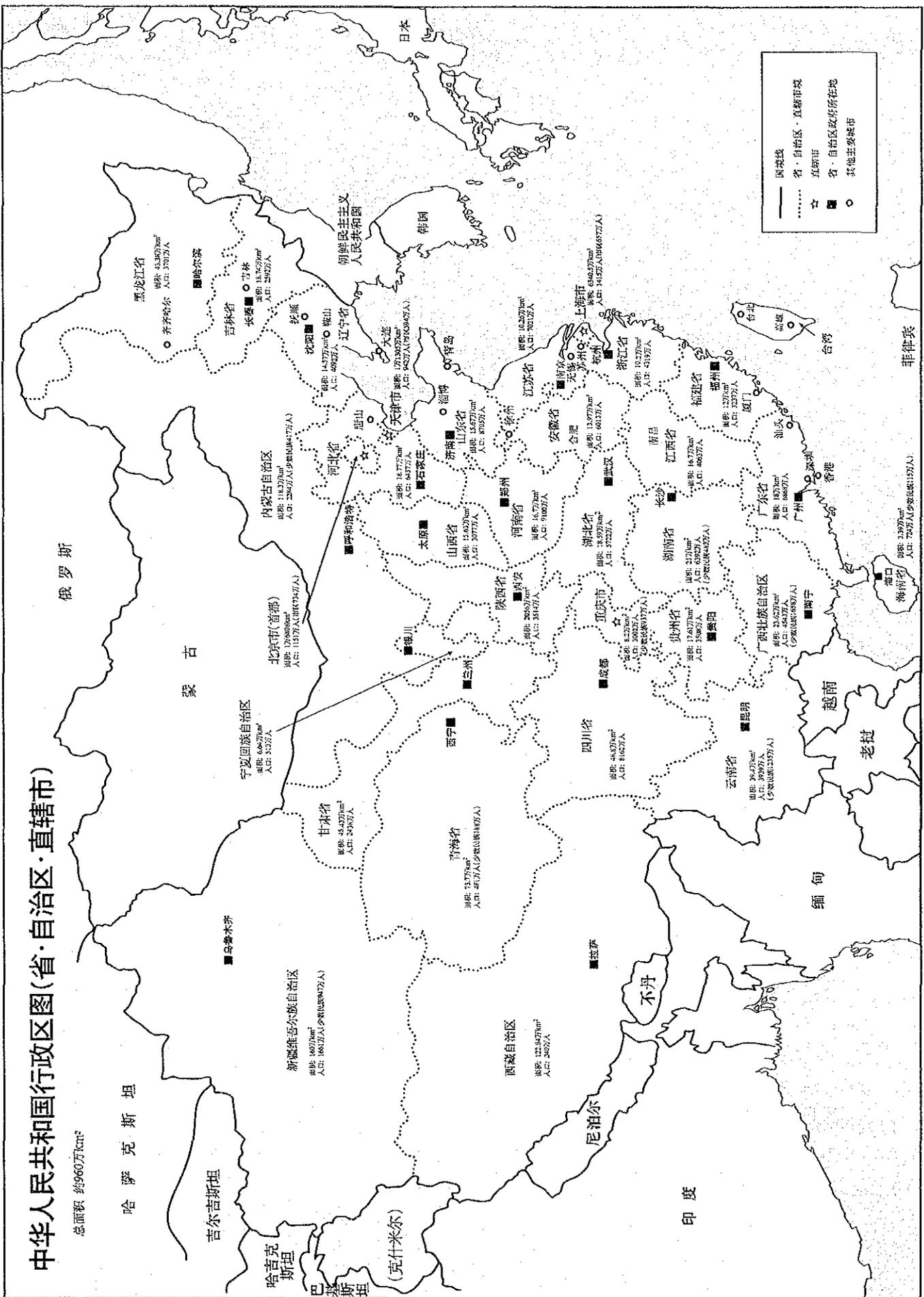
1999年2月

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图(省·自治区·直辖市)

总面积 约960万km²





1152749(6)

本报告书系根据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所设立的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的讨论编制而成。因此本报告书所陈述的建议并不一定反映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意见。

前 言

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

藤田 公郎总裁

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创建于1989年1月，已故大来佐武郎先生出任了第一次会长。1991年12月，研究会编写完成最终报告书，并提交给国际协力事业团总裁。

研究会成立当年的89年6月，在中国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当时中国政府对市民和学生所采取的对策令世界各国大为震惊，同时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陷入了极其孤立的境地。不仅由各国政府提供的政府贷款受到严格控制，海外企业对华投资也急剧降温，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曾一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的宏观经济也表现出了极为深刻的不稳定性。经济的过热增长使得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效应”突出地暴露出来，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能够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金融机制，因此不得不对工资、物价以及银行信贷等采取了直接的行政干预手段。结果虽然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也使得经济增长陷入了低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体制改革进程也因此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针对中国当时的局势，第一次研究会提出了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稳定经济、控制通货膨胀、缓解基础设施上的瓶颈效应为中心内容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方针，这项方针在当时而言可以说是适逢其时。

实际上，仅就经济而言，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在90年代前后已经基本结束，从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又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而再度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率确实曾一度令我们深感不安。但是以金融为中心采取的紧缩银根政策奏效，1996年以后中国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从宏观上看，应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高速增长。天安门事件以后国际上对中国的“偏见”已经完全消除，对华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尽管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的来说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事实证明，第一次研究会对于中国现状的分析以及依据该项分析做出的政策提案是正确的。针对缓解经济发展瓶颈效应的提案，作为政府开发援助（ODA），日本当时投入巨额资金帮助中国完善产业和生活基础设施，取得了巨大成果。

第一次研究会提案以后的7年时间，如果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审视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对于这些成就的取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随着这些年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作为发展过快的结果，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多的问题，亟待通过国家政策去加以解决。因此我们深感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也有必要探索一条与以往不同的新路。也就是说日本作为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提供国，必须从其自身采取全新的对策。

根据1997年6月有关财政结构改革的内阁会议决定，日本将在今后3年里持续削减

政府开发援助（ODA）的金额。特别是平成 10 年（1998 年），削减幅度将达到 10%以上，成为年度支出项目中削减比率最高的一项。尽管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但它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在目前从金额上进一步扩大政府开发援助（ODA）变得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实效性。

那么，今后应该如何去做呢？

迄今为止，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将重点放在了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供给部门、以及铁路、道路、港口等交通运输部门这一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基础设施的增长速度。基础设施薄弱成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显现出来。但是可以认为：这种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里表现出来的瓶颈效应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由于经济增长过快而造成的。如确实如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与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相适应的水平上，这必须由中国政府自己来解决。

加之中国当前与产业和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水平并不低。比如目前正在建设当中的长江三峡工程，所需的技术和巨额资金几乎都是国内自己解决的。我们认为：只要中国政府对其经济增长率再稍加控制的话，应该说完全有能力依靠国内自身的力量解决铁路、公路、港口以及发电厂等的建设问题。

因此，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应该逐步地从中国可以“自力更生”进行建设的领域中退出来，而把重点逐渐转移到那些仅靠中国的“自力更生”难以奏效，但在开发上、甚至在社会福利方面又不可或缺的领域中去。

由此，我们第二次研究会制定了 4 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消除贫困与缩小地区间差距、环境保护、农业开发·粮食供应、建立制度化的市场经济。

首先是消除贫困与缩小地区间差距。尽管在实行改革开放阶段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但目前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仍然居住着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在中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原本就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实行改革开放更加大了这种地区差异。虽然中国政府自己也认识到了加快开发贫困地区的重要性，但是在不得不把高速增长作为首要任务的今天，中国政府能够拿出用于贫困地区开发建设的资源实在是非常有限。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将消除贫困与缩小地区间差距作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的一个新的开拓领域。

其次是环境保护问题。目前中国的环境状况非常令人担忧，但环境保护问题却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中国目前的环保技术水平还很低，企业和百姓的环境意识还很淡薄。对于人均收入距 1000 美元的小康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不难理解当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环境治理工作现阶段还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难怪在中国肯于心甘情愿地投入巨额资金建设脱硫装置的火力发电厂寥寥无几。这也正是在环保技术方面具有优势的日本对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关心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农业开发·粮食供应。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粮食短缺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很低，这种现象也促使了大批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在通过低投入型技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开发并普及农产品的加步利用技术、完善农产品的流通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提供市场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等许多

方面都需要日本给予一定的援助。

第四是建立制度化的市场经济。近年来中国推行市场化经济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目前这种市场经济往往会出过头的现象，从而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并且这种倾向将来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我们认为当前迫切需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中国目前还非常欠缺有关确立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经验 and 诀窍。针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化、规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政府宏观控制、完善市场机制、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环保措施、建立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秩序、扶植中小企业、以及伴随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而出现的大批下岗职工的安置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日本有必要利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和诀窍，认真地帮助中国去加以对付和解决。

当然，日本并不具备足以支持政府开发援助（ODA）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全面开展这种多样化尝试的资源。相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今后数年间政府开发援助（ODA）还将有被逐渐削减的趋势。因此我们今后要将政府开发援助（ODA）的重点放在建立重点项目的“示范化”机制上，把 ODA 资金集中投入到试点地区，将试点地区的开发成果向周边地区推广。为形成这一机制，集思广益，研究对策。

以环境问题为例，目前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城市正受到环境污染的困扰，而且这些污染又涉及到大气、水质、固体废弃物等诸多方面。如果将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源分散地运用到所有地区的所有环保措施上，其结果很可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所以说“示范化”构想势在必行。我们必须考虑一种能让有限的 ODA 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充分利用的方式，即首先确定若干个“环境示范地区”，把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资金集中地运用于这些试点地区，再通过“示范效应”使试点地区的经验和成果向周边地区辐射。

在这点上，前年秋天桥本原首相在访问中国时提出了“面向 21 世纪的日中环境合作”构想，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赞同。因为构想的核心就是建立环境示范城市，所以说它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根据构想的精神，现在已经将大连、重庆、贵阳 3 座城市定为环境示范城市，同时还决定将治理大气污染作为实施援助的对象内容。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对于贫困地区的开发、增加农民收入等项目，也有必要同环境问题一样推进示范化构想的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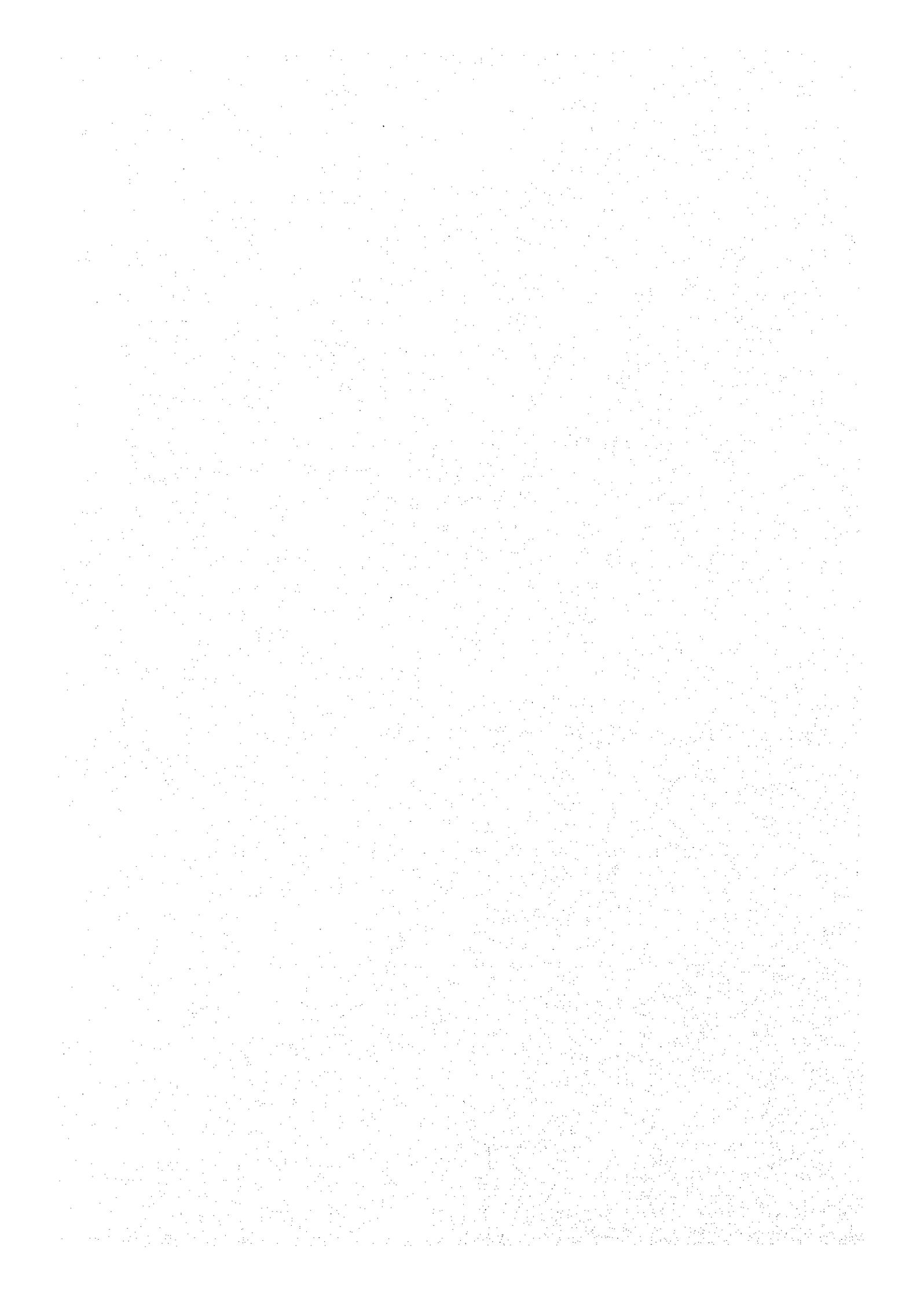
其它方面也存在着许多有待于深入探讨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希望您仔细地审阅这份报告书。总之，我们衷心希望这份报告书在日本政府制定对中国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的计划时能够起到较大的参考作用。

最后，谨对参加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的各位委员、特别工作组成员、以及事務局全体同事的大力协作致以衷心的感谢。

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

会长 渡边 利夫

1999 年 2 月



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委员名单

(敬称略，除会长以外其他人员按日语读音顺序排列)

会 长	渡边利夫 (WATANABE TOSHIO) 东京工业大学大学院社会理工学研究科教授
宏观经济	石原亨一 (ISHIHARA KYOUICHI) 神户大学国际文化系教授
工业开发	上原一庆 (UEHARA KAZUYOSHI) 京都大学 经济研究所教授
教育/人才资源	大冢丰 (OTSUKA YUTAKA)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教授
地区开发	加藤弘之 (KATOU HIROYUKI) 神户大学经济系教授
政治/行政	小岛朋之 (KOJIMA TOMOYUKI) 庆应义塾大学 综合政策系教授
农 业	田岛俊雄 (TAJIMA TOSIO)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
财政/金融	南部 稔 (NANBU MINORU) 神户商科大学商经系教授
基础设施	种 田 博 (OITA HIROSHI) 海外经济协力基金 业务第二部业务第一课课长 (截止到98年5月) 林 薰 (HAYASHI KAORU) 海外经济协力基金 业务第二部业务第一课课长 (自98年5月开始)
保健医疗	林 谦治 (HAYASHI KENJI) 国立公众卫生院 保健统计人口系系长
环 境	菱田一雄 (HISHIDA KAZUO) 海外经济协力基金 技术顾问
援助动向	八岛继男 (YASHIMA TSUGUO) (社) 国际善邻协会 环境推进中心顾问

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特别工作组成员名单

(敬称略, 除主查以外其他人员按日语读音顺序排列)

- 主 查 富本儿文 (TOMIMOTO IKUFUMI)
国际协力事业团国际协力专员
- 人才资源开发 伊泽映子 (IZAWA EIKO)
国际协力事业团无偿资金协力调查部调查二课实习专员
- 政治、行政 大久保恭子 (OOKUBO KYOUKO)
国际协力事业团国际协力综合研究所调查研究课 (兼职事务局)
- 运输、交通 奥屯彰一 (OKUMURA SHOUICHI)
通信 (基础设施) 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开发协力课 (自 98 年 4 月起派往外务省)
- 矿业、能源 加藤俊伸 (KATOU TOSHINOBU)
国际协力事业团矿工业开发调查部工业开发调查课代理课长
- 贫困问题 铃木启史 (SUZUKI HIROFUMI)
国际协力事业团研修事业部管理课
- 保健医疗 立场正夫 (TATEBA MASAO)
国际协力事业团调达部管理课代理课长
- 环 境 藤谷浩至 (FUJIYA KOUJI)
国际协力事业团社会开发调查部社会开发调查二课代理课长
- 妇女及开发 本田百合 (HONDA YURI)
国际协力综合研究所调查研究课
日本国际协力中心委派研究员 (截止到 98 年 4 月)
- 社会保障制度 前田比吕子 (MAEDA HIROKO)
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系专职讲师
- 宏观 经济 丸川知雄 (MARUKAWA TOMOO)
亚洲经济研究所经济开发分析项目组研究员
- 农 业 村田好子 (MURATA YOSHIKO)
国际协力综合研究所调查研究课
日本国际协力中心委派研究员 (截止到 98 年 2 月)
- 援助动向 渡边雅人 (WATANABE MASATO)
国际协力事业团企画部地域第二课
- 事 务 局 中村律子 (NAKAMURA RITSUKO)
国际协力综合研究所调查研究课
日本国际协力中心委派研究员 (截止到 98 年 9 月)
- 味木志绪美 (MIKI SHIOMI)
国际协力综合研究所调查研究课
日本国际协力中心委派研究员

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报告书

目录

一、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进展及日本对华援助的成果	1
1、社会经济开发的进展	1
2、第一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以后的对华援助成果	5
2-1 第一次研究会的提案概要	5
(1) 新基本原则	5
(2) 第一次研究会的对华援助的重点领域	5
(3) 对华援助的重点地区	6
2-2 重点领域的援助成果	6
(1) 日元贷款	6
(2) 无偿资金援助及技术合作	7
2-3 关于对重点地区援助资金的分布情况	9
2-4 援助政策对话、立项调查以及调查研究的成果	10
(1) 援助政策对话	10
(2) 立项调查	11
(3) 调查研究	11
3、中国方面的评价	11
4、从实施援助的过程中得到的收获	13
4-1 实施日元贷款过程中的收获	13
4-2 实施无偿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过程中的收获	13
二、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现状和课题	15
1、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现状	15
2、开发的课题	19
2-1 社会经济开发方案	25
三、今后实施对华援助的方法	27
1、援助的基本方向	27
2、第二次研究会的基本立场	29
3、实施对华援助的目的	29
4、当前关于对华援助的原则的理解	30
5、援助的重点领域和地区	31
5-1 消除贫困和地区差异	31
(1) 基本方向	31
(2) 保健医疗	33

(3) 教育与人类开发	34
(4) 帮助农村脱贫	35
(5) 社会保障	35
(6) 妇女与开发	37
5-2 环境保护	39
(1) 基本方向	39
(2) 在大气污染和酸雨对策方面的援助	41
(3) 在水质污染对策方面的援助	42
(4) 城市环境保护	43
(5) 森林保护以及治水防灾	43
5-3 农业开发和粮食供应	44
(1) 基本方向	44
(2) 在提高农民收入、消除贫困和地区差异方面的援助	45
(3) 以农业产业化为目标的援助	46
(4) 在农业产品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市场运营方面的援助	46
(5) 具有辐射效果的农业援助	47
5-4 制度化市场经济的建立	47
(1) 基本方向	47
(2) 国有企业改革	48
(3) 扶植发展中小企业	49
(4) 财政金融制度	49
(5) 宏观控制	50
(6) 对能源领域的援助	51
(7) 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52
5-5 重点地区	54
6、援助的具体方法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60
6-1 扶贫工程的示范典型	61
(1) 世界银行的扶贫工程	61
(2) 日本援助的扶贫工程实例(资料8)	62
6-2 关于援助的示范化及其普及方法	64
7、与其他援助机构的合作和与中国之间的南南合作	66
7-1 与双边、多边援助结构的合作	66
7-2 与 NGO、地方自治体以及民间组织的合作	69
7-3 与中国之间的南南合作	70
8、结论以及今后推进援助问题研究的方法	71
8-1 本次(第二次)研究会的结论	71
8-2 今后推进援助问题研究的方法	72

图表一览

表 1-1	财政收入	2
表 1-2	人类开发相关指标	4
表 2-1	七大经济区	23
表 2-2	“九大城市圈”构想	24
表 2-3	中国“九五计划和 2010 年长期计划”的目标	25
表 2-4	世界银行“China2020”的预测	25
表 2-5	实际值	26
表 2-6	目标年份各项指标的设想	26
表 3-1	性别开发指数 (GDI、1994 年)	37
表 3-2	性别社会参与情况测定	38
表 3-3	各省关联指标一览	59
表 3-4	参与扶贫活动的方式	64
图 1-1	实质 GDP 和 GDP 增长率的推移	2
图 1-2	通货膨胀率的推移	2
图 1-3	贫困人口	3
图 1-4	日元贷款的提供实绩	7
图 1-5	无偿资金援助的提供实绩	8
图 1-6	日元贷款各地区分配比例的变化	9
图 1-7	无偿资金援助各地区分配比例的变化	10
图 2-1	收入差距拉大	16
图 2-2	七大经济区	23
图 2-3	“九大城市圈”构想	24
图 3-1	各省、自治区的贫困人口 (贫困县内)	56
Box1.	中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问题	18
Box2.	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影响	20
Box3.	关于“下岗”问题	21
Box4.	ODA 大纲与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31
Box5.	关于帮助下岗女工再就业	38
Box6.	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41
Box7.	机构改革	51
Box8.	对象示范区域的选定标准	57
资料 1	日本对华援助实绩 1979~1990 (各省分配比例)	77
资料 2	日本对华援助实绩 1991~1996 (各省分配比例)	78
资料 3	日本对华援助实绩 1979~1996 (各省分配比例)	79
资料 4	世界银行对华援助实绩 1982~1997 (各省分配比例)	80
资料 5	亚洲开发银行对华援助实绩 1987~1997 (各省分配比例)	81
资料 6	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组织系统图	83
资料 7	世界银行扶贫项目实例	85

资料 8 日本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开展的扶贫项目实例	87
资料 9 其它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的对华扶贫援助实绩	89
资料 10 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日本主要的非政府组织 (NGO)	95
资料 11 与内陆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结成友好城市的日本地方自治体	96

略 语 表

ADB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亚洲开发银行
APEC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TC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 纺织品协定
AusAID	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厅
BHN	Basic Human Needs	基本人类需求
BOT	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	BOT 方式
CICETE	China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 中心
CIDA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加拿大国际开发厅
COFTEC	Commission for Foreign Trade & Economic Corporation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
DAC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开发援助委员会
DOFITEC	Department for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rporation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EU	European Union	欧盟
F/S	Feasibility Study	可行性调查
FAO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联合国粮农组织
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DI	Gender Development Index	性别开发指标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国内生产总值
GEM	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ment	性别参政状况测定
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国民生产总值
GTZ	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 GmbH	德国技术合作公社
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人类开发指标
IBRD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世界银行 (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
ID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国际开发协会 (第二世 界银行)
IFAD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ILO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s	国际劳工组织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JICA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国际协力事业团
KfW	Kreditanstalt for Wiederaufbau	复兴金融金库 (德)
LGPD	The state Council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
MFA	Multi Fiber Arrangement	多边纤维协定
MOFTEC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NGO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政府开发援助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F	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海外经济协力基金
PADO	Poor Area Development Office	贫困地区开发办公室
PHC	Primary Health care	初级卫生保健
PLG	Project Leading Groups	项目领导小组
PMO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项目管理办公室
UNAIDS	The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联合国爱滋病计划
UNCED	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联合国环境开发会议
UNDP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V	United Nations Volunteer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
WFP	World Food Programme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一、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进展及日本对华援助的成果

1、社会经济开发的进展

第一次中国援助研究会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发又有了怎样的进展？

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始创于 1989 年，已故大来佐武郎先生出任了第一次会长。1991 年 12 月研究会向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总裁递交了最终报告书。

归纳这份报告时中国的状况是虽然自 1979 年起已经施行了 10 年改革开放的政策，但国内的宏观经济尚不十分稳定，改革开放路线面临着逆行、倒退等种种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第一次研究会最终报告书立足于支持改革开放路线的基点，就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克服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效应等问题提出了有益的见解。

从 1991 年第一次研究会提出报告书后至今（1998 年）又经过了 7 年的时间，其间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发也取得了新的进展。这次组成的以东京工业大学大学院渡边利夫教授为会长的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就这一过程中的要点归纳如下：

中国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了宏观经济的高度增长，经济发展较为稳定。

在宏观经济方面，经历了 20 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后，中国实现了接近于年均 10% 的高速增长。随着国际化、制度化的进展，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质的转变。对此我们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政策中应该给予肯定的一面。

1991 年以后，中国的实际 GDP 增长率已经接近于 11%。但另一方面，由于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出现的经济过热，在 93 至 95 年期间，通货膨胀率一度上升到两位数。其后中国政府及时地推出了适度的紧缩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在 1996 年下降到 6%，1997 年又进一步下降到 3%。从数字上看，应该说中国经济基本上属于稳定发展。

在财政改革方面，为了消除慢性财政赤字，中国于 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所谓分税制就是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责任，以确保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国家财政资金的 60%。另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中央银行从 94 年起停止发放贷款，同时将财政预算划分为经常预算和建设预算两项，对于建设预算的缺口，改为通过发行赤字国债的方法进行补充。

在金融方面也加快了改革的进程。中国强化了为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所需人民银行的机能，同时通过让其它的国家银行与政策性业务脱钩，逐步使其向商业银行转化。

图 1-1 实际 GDP 和 GDP 增长率的推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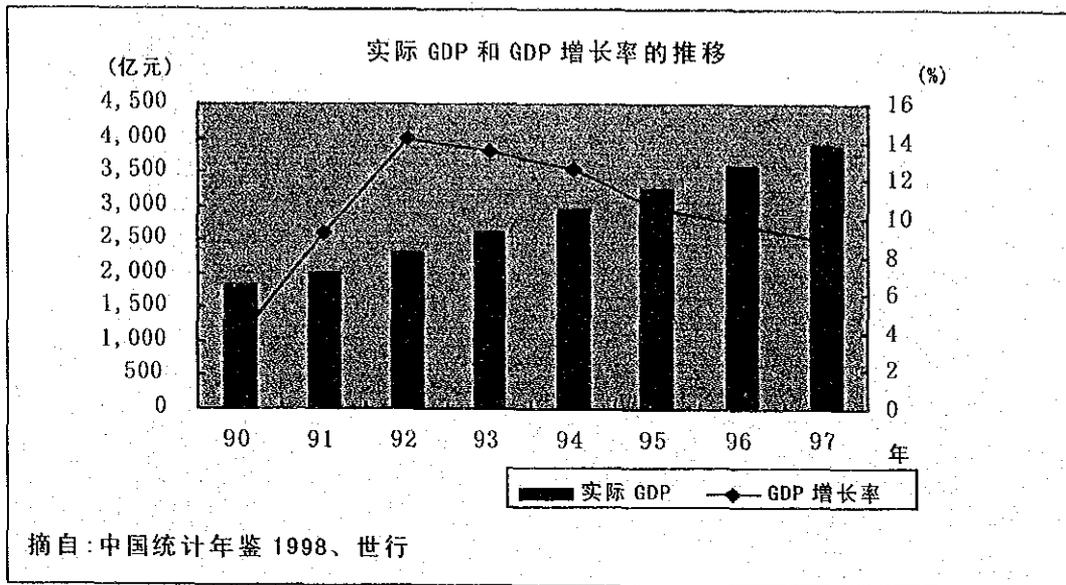


图 1-2 通货膨胀率的推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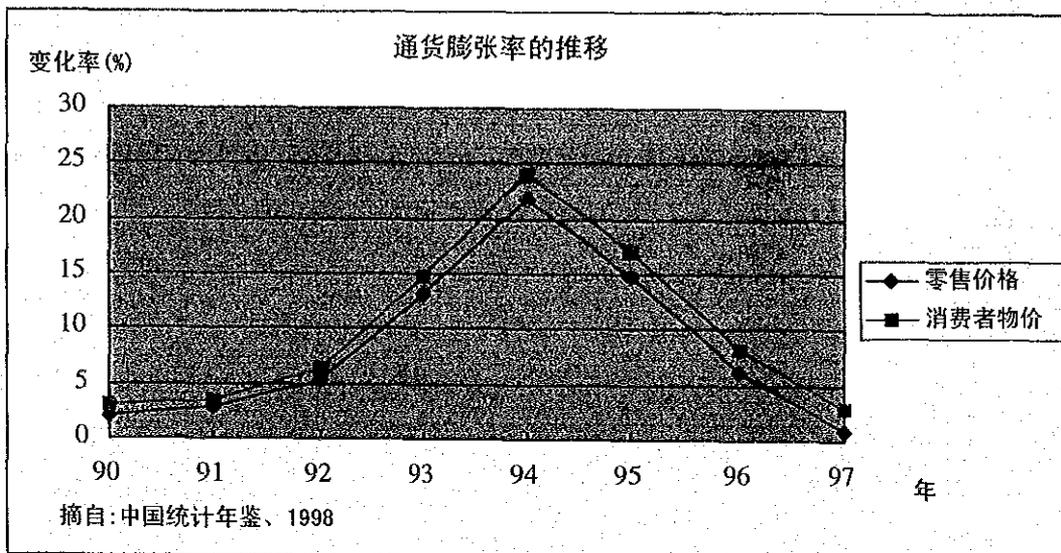


表 1-1 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中央政府	979.51	957.51	2,906.5	3,256.62	3,661.07	4,226.9
地方政府	2,503.86	3,391.44	2,311.6	2,985.58	3,746.92	4,424.2
合计	3,483.37	4,348.95	5,218.1	6,242.2	7,407.99	8,6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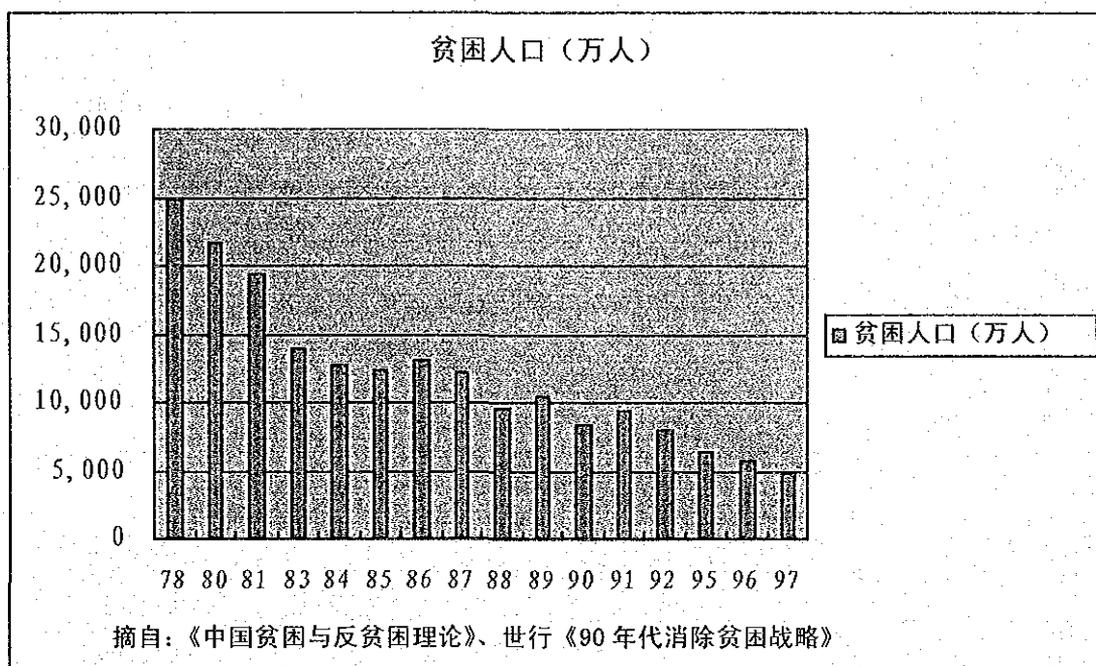
摘自：中国统计年鉴 1998

对于进行市场经济化主要支柱的国有企业改革，第 14 次党代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即抓大放小）的目标，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同步进行的方针。同时对于与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的政府部门的撤消、合并和重组问题，决定从去年（1998 年）3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以后对中央政府机构实行大规模的改组。（关于行政改革的具体情况请参照“Box7. 机构改革”和“资料 6 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组织系统图”）

从社会角度上看，中国正在努力消除贫困和地区差异、推进医疗和教育改革。

有关报告显示，1979 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大约为 2 亿 5000 万人，1985 年为 1 亿 2500 万人，截止到 1997 年已经减少到了 5000 万人。（1985 年农村地区的贫困线标准为人均年收入 206 元以下，其后根据物价上涨指数不断进行调整，到 1997 年已经上升为 630 元）

图1-3 贫困人口 (万人)



根据中国的贫困对策，国务院于 1986 年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并于 1994 年制定出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中期目标。按照这个计划，以在 2000 年之前消除贫困人口作为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指定 592 个贫困县集中实行脱贫。另外，为了消除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将对内陆省份的铁路、公路、灌溉、水利、农村饮用水等基础设施重点进行投资建设。

关于教育改革，1993 年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根据市场竞争原理和注重

能力的原则，中国的教育开展着以追求多样化、实效化、灵活化和开放化为目标的改革。特别是为了发展边远地区和贫困山区的文教事业，中国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启动了由民间慈善事业人士和社会团体集资办学的“希望工程”，另外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和财政部还在 97 至 99 年的 3 年中组织了特别资金帮助贫困地区充实义务教育。

在医疗保健方面，1997 年中国全国的粗死亡率为 6.51%，与同时期日本的 7% 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当年的人口增长率为 10.06%，与 80 年代后期的 14% 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97 年的人口总数为 12 亿 3,626 万）。另外，当年的人均寿命为 69 岁，高于发展中国家 62 岁的平均值，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从 50 年代初期起死亡率开始下降，70 年代以后直到今天，死亡率一直保持在 6~7% 之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点应该归功于中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初级卫生保健（基础医疗 PHC = Primary Health Care。即不仅限于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同时以地区为单位对改善人体健康状况所必须的各种要素实行统一管理）。

表 1-2 人类开发相关指标

指 标	中国	泰国	印度 尼西亚	日本	发展中国家 平均值
人类开发指标排名(HDI)	108 位	59 位	99 位	7 位	全世界 175 个国家
平均寿命(年) 1994 年	68.9	69.5	63.5	79.8	61.8
不能享受医疗保健服务的人口比例(%) 90~95 年	12	10	7	-	20
得不到安全卫生用水的人口比例(%) 90~95 年	33	11	38	3	29
婴儿死亡率(‰) 1994 年	43	29	53	-	64
不满 5 周岁的体重超轻儿童(%) 1994 年	16	26	35	-	32
成人识字率(%)	80.9	93.5	83.2	99.0	69.7
接受初、中、高等教育的总就学率(%) 1994 年	58	53	62	78	56

摘自：UNDP《人类开发报告书 1997》及其它

中国正在为改善环境、保障粮食的稳定供应、克服能源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效应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中国的环境问题应该说非常严重。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采取了具体的治理措施。1996 年制定的《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第 9 个五年计划及 2010 年长期目标》是中国实施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计划，政府将根据这项计划全面

能力的原则，中国的教育开展着以追求多样化、实效化、灵活化和开放化为目标的改革。特别是为了发展边远地区和贫困山区的文教事业，中国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启动了由民间慈善事业人士和社会团体集资办学的“希望工程”，另外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和财政部还在 97 至 99 年的 3 年中组织了特别资金帮助贫困地区充实义务教育。

在医疗保健方面，1997 年中国全国的粗死亡率为 6.51%，与同时期日本的 7% 相比也毫不逊色。同时当年的人口增长率为 10.06%，与 80 年代后期的 14% 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97 年的人口总数为 12 亿 3,626 万）。另外，当年的人均寿命为 69 岁，高于发展中国家 62 岁的平均值，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从 50 年代初期起死亡率开始下降，70 年代以后直到今天，死亡率一直保持在 6~7% 之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点应该归功于中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初级卫生保健（基础医疗 PHC = Primary Health Care。即不仅限于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同时以地区为单位对改善人体健康状况所必须的各种要素实行统一管理）。

表 1-2 人类开发相关指标

指 标	中国	泰国	印度 尼西亚	日本	发展中国家 平均值
人类开发指标排名(HDI)	108 位	59 位	99 位	7 位	全世界 175 个国家
平均寿命 (年) 1994 年	68.9	69.5	63.5	79.8	61.8
不能享受医疗保健服务的人口比例 (%) 90~95 年	12	10	7	-	20
得不到安全卫生用水的人口比例 (%) 90~95 年	33	11	38	3	29
婴儿死亡率 (%) 1994 年	43	29	53	-	64
不满 5 周岁的体重超轻儿童 (%) 1994 年	16	26	35	-	32
成人识字率 (%)	80.9	93.5	83.2	99.0	69.7
接受初、中、高等教育的总就学率 (%) 1994 年	58	53	62	78	56

摘自：UNDP《人类开发报告书 1997》及其它

中国正在为改善环境、保障粮食的稳定供应、克服能源和基础设施薄弱的瓶颈效应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中国的环境问题应该说非常严重。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采取了具体的治理措施。1996 年制定的《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第 9 个五年计划及 2010 年长期目标》是中国实施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计划，政府将根据这项计划全面

开展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为了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中国在 95 年对《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了修改，增加了限制使用高硫煤等新的环保措施。

中国还投入巨大精力解决水质污染问题，重点加强了对“三河三湖”的治理。国家还特别要求淮河流域内的所有工厂都必须在 1997 年底之前达到排放标准。

另外，中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针对粮食供应上可能出现的近期、中期市场变化及长期需求关系制定明确的政策。同时中国政府还在缩小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差距、通过更新技术和完善基础设施以缓解资源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改进流通结构促进范围扩大的市场形成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经过上述努力，中国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91 至 95 年的 5 年之间，中国的发电装机容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9%，95 年的总发电量达到了 2 亿 1 千万千瓦。同时，铁路运营距离增加了 3,000 公里，1997 年度铁路运营总距离大约为 57,600 公里。并且新建、改建了 92,000 公里的公路，使公路总长度在 1997 年增加到 1,226,400 公里^{注 1}。

2、第一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以后的对华援助成果

日本的援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2-1 第一次研究会的提案概要

在 1991 年 12 月提出的国别援助研究报告书中，曾就有关对华援助的“新基本原则”、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阐述了第一次研究会的见解，其主要内容如下：

(1) 新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为了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

第二原则——支持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第三原则——通过发展经济改变各方面的失衡状态

第四原则——注重中国的人口和国土规模

(2) 第一次研究会的对华援助的重点领域

a. 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开发：

支援中国的经济改革，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

^{注 1} 请参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9 个五年计划及 2010 年长期目标纲要》及中国统计年鉴 1998。

- b. 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扩大粮食生产能力，缩小地区间差距，解决城市问题。
- c. 实现可持续发展：
保护环境、防止公害发生，恢复森林、实现绿化。
- d. 促进日中文化交流：
开展青年交流、对日本的研究及文化遗产的保护。

(3) 对华援助的重点地区

- a. 对沿海地区：
通过对民间部门的工作进行侧面支援，帮助中国完善成为瓶颈的基础设施、并提供软件。
- b. 对内陆资源蕴藏量丰富的地区：
强化其作为沿海地区的资源供应基地的作用，同时重视当地自身的发展。
- c. 对内陆贫困地区：
努力缩小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地区间差距，从这一立足点出发，充实当地的基本人类需求（BHN = Basic Human Needs）。

2-2 重点领域的援助成果

(1) 日元贷款

从 1979 年日元贷款开始实施以来截止到 1996 年，这期间承诺提供贷款的项目累计达到 210 件，总金额超过 1 兆 8500 亿日元。其中在 1979~1990 的 12 年当中提供的资金总额约为 9900 多亿日元，1991~1996 年期间提供的资金总额约为 8500 亿日元。并且从 91 年以后，每年提供贷款的金额急剧增加，91~96 年期间的平均年贷款数额为 90 年以前的 1.7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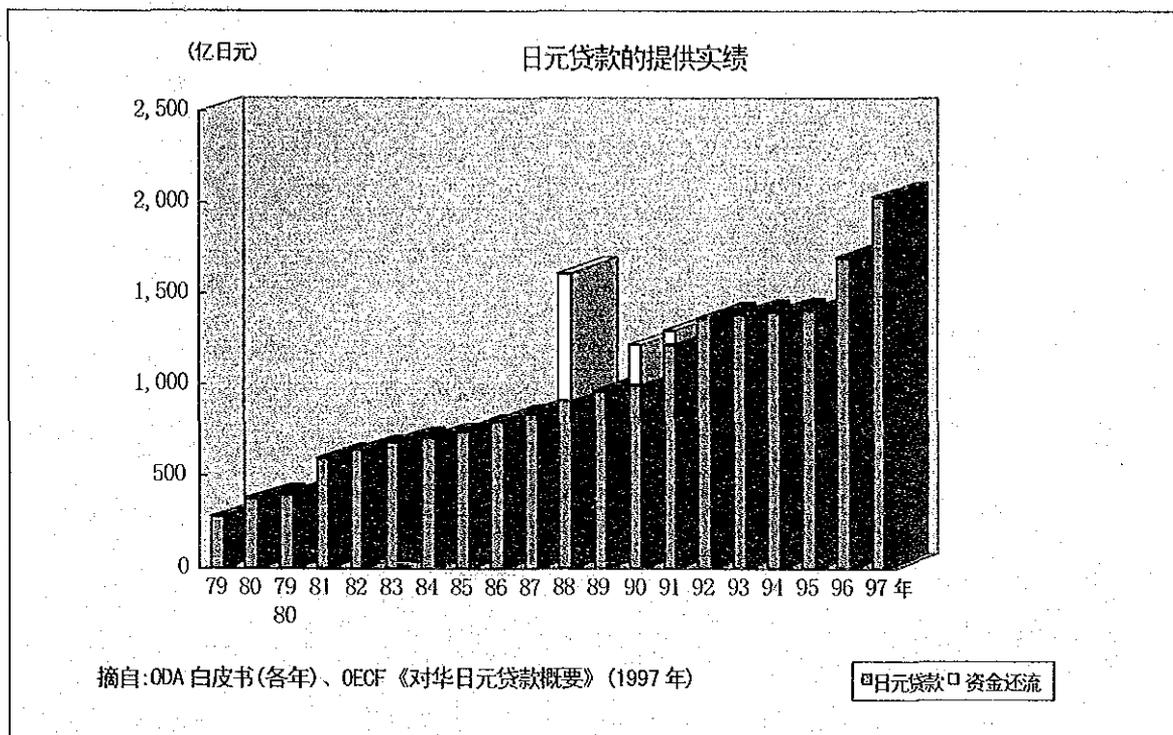
关于援助的重点领域，按照“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开发”当中“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效应”的方针，援助的重点领域大多集中在铁路、地铁、公路、桥梁、港湾、发电站以及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

另外，根据“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的方针，将化肥厂、粮食基地、灌溉设备等农业建设项目以及水处理厂等解决城市问题的项目也列为了援助的重点领域。

关于“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90~97 年间利用日元贷款投资建设的环保项目共有 16 项，预计今后环保项目所占的比重将会进一步加大。

对于从 1996 年开始起动的第 4 次日元贷款，第一次研究会的提案报告中表示准备在前 3 年即 96~98 年期间提供 5800 亿日元援建 40 个项目。

图1-4 日元贷款的提供实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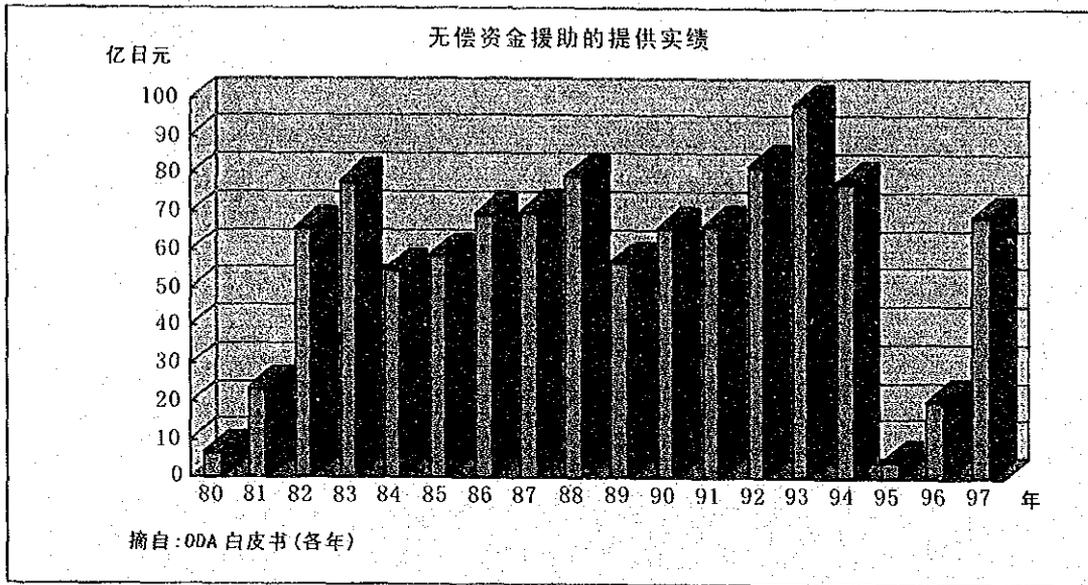


(2) 无偿资金援助及技术合作

对每个重点领域基本上都保持了一定的平衡。特别是对于“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开发”和“推动经济平衡发展”这两个重点领域的援助实现了稳步增长。

根据“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的方针，在对医疗保健领域实施援助方面，对北京、上海以及各省（自治区）主要城市的医疗机构开展了以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为中心，提供了先进医疗器械和设备、及为转让诊断治疗技术的援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得到了中方的好评。近年来，为地方医院提供医疗器械的比重又有所增加，同时在预防脊髓灰质炎等疾病方面与各地区的防疫部门开展了密切的合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控制脊髓灰质炎项目”，在日中两国政府的“消灭脊髓灰质炎计划”的有力支持下，有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投入和活动，已经显示出相当可观的成效。这项与地区密切合作的工作充分反映在政策的制定上，援助人员与各地密切配合，与各级脊髓灰质炎防治部门开展了融洽的合作，项目领导和专家组成员在长期持久的共同合作中建立起了日中间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可以说“中国控制脊髓灰质炎项目”成为了援助贫困地区医疗保健事业的示范项目。

图1-5 无偿资金援助的提供实绩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援助工作特别强调了“保护环境、防止公害发生，恢复森林、实现绿化”的内容，明确提出了具体的援助方向，并以此为契机使日本在中国环境领域的的援助活动正式起步。其中主要是通过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建设了日中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同时在防止产业公害技术、大气污染及水质污染对策、环境监测、植树造林防止沙漠化等一系列的领域中开展了援助活动。另外还通过日元贷款，对城市上下水设施和城市燃气供气设施等与环境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改、扩建工程提供了援助。

日中两国于1994年3月缔结了《日中环境保护合作协定》^{注2}。其后，由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团体以及民间团体参加的第一次、第二次“日中环境合作综合论坛”分别于95年5月和97年11月在北京和东京召开。1997年9月，在纪念日中恢复邦交25周年的活动中，当时的桥本首相和李鹏总理之间又达成了包括《日中环境开发示范城市构想》^{注3}和《环境信息网络》^{注4}等内容的“日中面向21世纪环境合作”意向。1998年3月，为商讨《日中环境开发示范城市构想》的具体合作内容而设立的日中专家委员会将大连、重庆、贵阳选为示范城市。

^{注2} 根据开展横向研究合作的观点，1994年3月由日中两国有关的部、局参加，就排水处理、污染状况进行监视等问题签署的协定。同年12月，由中日两国有关的部、局参加，召开了第一次联席委员会，决定就与排水处理、污染状况监测相关的9个项目开展研究合作（日方参加单位包括外务省、环境厅、通产省、农水省等；中方参加单位有国家环保局、国家海洋局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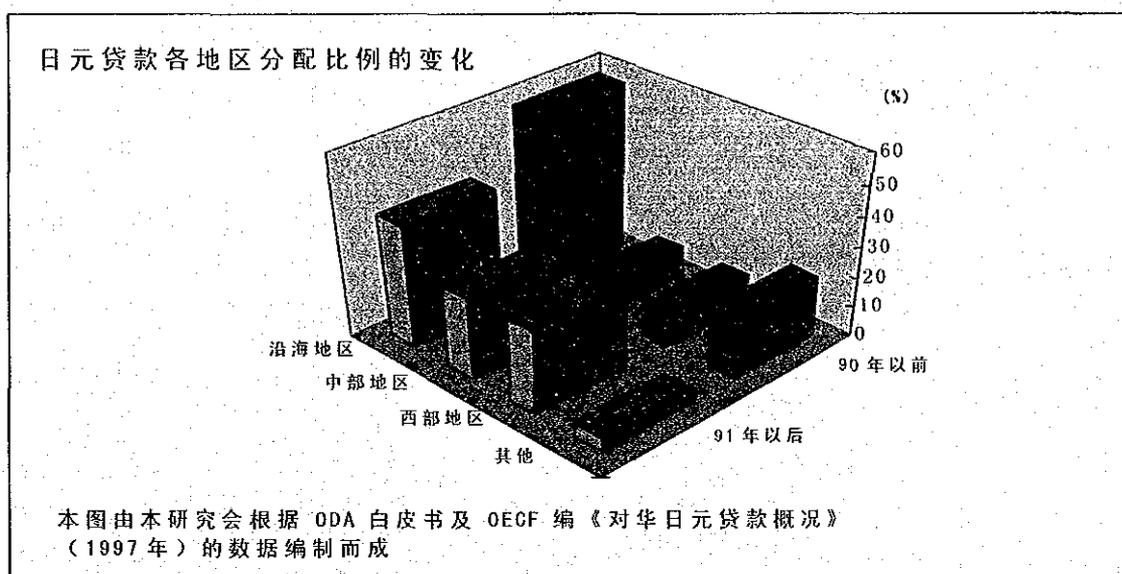
^{注3} 在中国国内设定示范城市，以①治理大气污染（酸雨）；②建设再循环型产业并形成社会体系，利用脱硫过程中产生的硫酸生产石膏和化肥③缓解温室效应影响为主要内容，通过树立典型向全国推广成功经验的构想。

^{注4} 为了进一步推动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为核心展开的各项合作，与世界银行合作，建立全国规模的信息网络。具体援助内容包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100座主要城市中设置用于处理环境信息的计算机网站，并负责对人才进行培训。

2-3 关于对重点地区援助资金的分布情况

关于日元贷款在各地区分配的情况，1979~1990年期间，利用日元贷款较多的省份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依次为山东省（占79~90年日元贷款总额的13.5%）、河北省（11.4%）、北京（8.0%）、江苏省（7.5%）、广东省（5.8%）。另外，完全没有接受日元贷款的省份有4个，接受了日元贷款但所占比例小于1%的省份有11个。而到了1991~1996年期间，完全没有接受日元贷款或接受贷款比例小于1%的省份减少到了5个，并且各省接受日元贷款的平均金额也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资金走向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展开。79~90年期间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利用日元贷款的分配比例为58:11:11，而到了91~96年期间这一比例变成了40:22:28，由此可见日元贷款对中国中、西部的分配比例有了明显的增加。

图1-6 日元贷款各地区分配比例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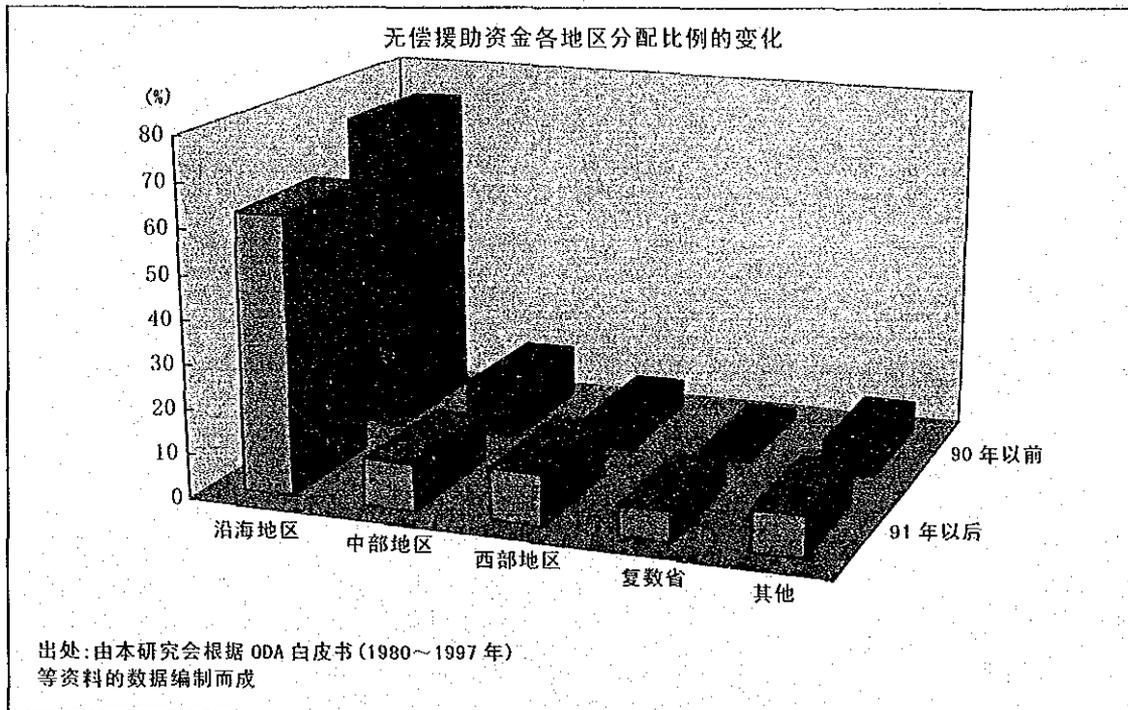


关于无偿资金援助（包括利民工程（小规模无偿资金援助）、紧急灾害援助及粮食增产等）在各地区分配的情况，1979~1990年期间无偿资金援助资金的69%集中在北京地区，其次为吉林省（9%）和上海市（4%）。而到了91~96年期间，对北京地区分配的比例减少到了38%，分配走向开始呈现出向全国分散的趋势。另外，90年以前接受无偿资金援助的仅有12个省，而到了91~96年期间就扩大到全中国所有地区。并且在91年以后还采取了同时向若干个省份提供无偿资金援助（6%）的方法。

在技术合作方面，根据现在对各省接受援助单位所掌握的情况，从“开发调查”、“专项方式技术合作”及“单项器材提供”等项加在一起的实绩来看，91年以后，相反倒是沿海地区接受技术合作的比例上升了10%，对复数省及中部地区提供的技术合作所占的比

例相对减少。另外，对各省接受技术合作的实际情况没有具体统计，但接待赴日本研修人员的实绩在91年以后确实有了大幅度的增加（79~90年12年期间的接待实绩为70.7亿日元，而91~96年的6年之间就达到了71.67亿日元）。

图1-7 无偿资金援助各地区分配比例的变化



2-4 援助政策对话、立项调查以及调查研究的成果

(1) 援助政策对话

1992年3月，日本政府鉴于第一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的提议，派遣经济援助综合调查团（大来团长）与中国政府进行了政策对话。结果，双方就经济援助的方针达成了一致意见。其中在援助领域方面确定了 a.经济基础设施 b.农业 c.环境 d.医疗保健 e.人才培养 5 项内容，在援助地域方面确定了 A.利用有偿资金援助完善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 B.以缩小地区间差距为目标，开发农村和农业生产，满足贫困地区的人民基本需求（BHN），充分利用内陆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 C.发挥各地区的优势，扩大经济援助对周边地区的波及效果 3 项内容。

根据经济协力综合调查团的与中方达成的共识，日本政府制定了对中国的国别援助方针，在该方针中明确写进了上述援助领域和援助地区的内容。

日中两国政府每年都要在北京或东京举行有关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的年度会议，就援助的重点领域等问题开展政策对话，同时讨论各年度的具体实施项

目。通常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分别进行各自的年度会议，但在 1998 年 6 月，作为首次尝试，将三种援助形式的年度会议合并在一起共同进行了讨论。

(2) 立项调查

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的立项调查一般将着眼点放在特定的领域，尤其更多地集中在环境领域。91 年对中国南部地区的大气污染开展调查、92 年对环境整体（特别是大气污染）开展调查、95~97 年期间又进行了第一次至第三次环境领域调查。另外，97 年 1 月还对农业领域开展了调查，并且提出了以《中国农业的课题——粮食流通》为题的调查报告。

(3) 调查研究

作为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的开发援助研究所的调研成果，于 1995 年 9 月发表了《中国粮食供求预测及对农业开发政策的建议》，同年 11 月发表了《中国的财政金融改革及地域开发》，1997 年 7 月发表了《中国地域开发的现状及课题》，1998 年 2 月又发表了《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3、 中国方面的评价

日本对中国开展的援助从 1979 年开始，到 1998 年已经走过了 20 年的历程。在 1979~1996 年期间，日元贷款提供的资金超过了 1 兆 8500 亿日元，技术合作（包括开发调查、专项方式技术合作、单项器材提供、接收进修生、派遣专家和青年海外协力队、二十一世纪友谊计划等）提供的资金超过 1000 亿日元，并且作为无偿资金援助还提供了大约 1000 亿日元的资金（91~96 年期间日元贷款、技术合作、无偿资金援助的金额分别为 8500 亿、400 亿和 410 亿日元）。相当于每一个日本国民都支援了中国 2 万日元。所有这些都是出于对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的愿望，希望中国能够稳定地发展起来。

对于日本的这些援助，中国方面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过以普通中国人为对象的民意调查，但桥本前首相在 1997 年 9 月访问中国，会见当时还是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时，朱先生曾说过“日元贷款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表示感谢”这样的话。另外，本次（第二次）研究委员会在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时，也听到中方有关人员对日本援助做出下述的评价。

首先，从负责接受技术合作的窗口机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现改名为科学技术部）及负责接受日元贷款和无偿资金援助的窗口机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那里，听到人们异口同声地对日本的援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比如，国家科委在评价与日本进行的技术合作时表示：

◎ 有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在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两国友好关系方面带来了重大

的成果。

- ◎ 虽然投资金额不是很大，但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对国民生活发挥了作用。
- ◎ 在许多方面建立了两国间的合作关系，并促进了人员方面的交流。
- ◎ 为中国的经济奠定了基础，为促进两国间贸易的发展发挥了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司（负责接受无偿资金援助）对日本的无偿资金援助做出了以下评价：

- ◎ 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 ◎ 特别是有关社会福利的项目得到了高度评价。
- ◎ 无偿资金援助为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和经济贸易关系发挥了作用。

另外，据外经贸部反映，有关新闻媒体对日本无偿资金援助项目组织了巡回考察，同时利用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对中外的大众传播媒体积极地开展了公关宣传活动。有关中国国民对日本的经济援助缺乏了解的说法不够正确，相反人们不仅对日本在北京等大城市援建的中日友好医院以及在吉林省长春市援建的自来水厂非常了解，而且日本在中国内陆地区援建医院、学校等情况也都广为人知。

外经贸部贷款管理司在评价日元贷款时认为：

- ◎ 自 1979 年以来，日元贷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 ◎ 对符合中国政府制定的发展方针的重点项目，优先安排日元贷款。
- ◎ JICA 的开发调查工作对提高日元贷款项目的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利民工程的总预算约为 3 亿日元，分配到各个项目中的金额平均仅有 1000 万日元左右。但据有关报告反映，投资收效比十分明显，快速灵活，并且能够直接针对各地区的扶贫工程开展援助，在上至省长下至村民百姓中有着很深的影响，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直接的感谢。

同时，从一些援助实施单位也听到了对实施援助的要求和希望。有的意见认为中国在某些领域中也积累了不少的专业知识技术诀窍，中日间的合作应本着发挥双方专业特长的原则进行，特别是在编写可行性调查报告和环境评价报告时，希望日方更充分地利用中方的咨询公司。

4、 从实施援助的过程中得到的收获

4-1 实施日元贷款过程中的收获

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日元贷款项目进展都很顺利，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也有个别项目由于以下种种原因未能按期完成。

- ◎ 由于中国内部加强了对债务的管理，影响了项目的进度。
- ◎ 由于日元升值所带来的汇率风险，使得具体负责偿还的机构发生了拖欠。
- ◎ 国内配套资金的筹措遇到困难，影响了项目的进展。
- ◎ 在一些贫困省份，由于应该由省政府出资的部分不能及时到位，致使项目工期长时间推后。

从以上情况看出，目前已需要中国政府进行一些资金援助。或者应该研究一下引进世界银行等的“候补项目表+滚动计划”方式^{注5}。

4-2 实施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过程中的收获

中方接受援助的各个窗口单位存在着彼此缺少横向联系的问题，但这个问题随着中方各部门之间相互沟通的加强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同时中方与设在当地的日方负责援助事务的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逐渐密切起来。其原因之一就是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的年度会议改为合并举行，并且为了提高各项援助之间的互补性，将本年度 1998 年度的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的年度会议也改成合并举行。

另外，以往的做法是对各个申请项目进行逐一的研究，而现在更加重要的是帮助中方开展包括各领域调查、地域综合开发计划调查等在内的更高层次的策划。日方在地域综合策划方面的经验诀窍也得到了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同时为了让援助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开发优良项目方面也有必要提高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各省计委的参与力度。

为了克服根据受援国要求进行援助的制约，日本还通过政策对话方式，主动地就一些中国经济开发所亟需的，同时又是日本有能力提供援助的领域向中方提出援助方案。为了使这种由日方提案的援助项目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日方的积极性，同时也需要中方在预算、人员、组织机构等给予多方面的配合。总而言之，必须努力开辟出一个能让中方充分理解援助项目的内容、并愿意作为主体参与实施的环境。

另外，为了进一步加强中方负责接受援助的窗口机构及有关省、部委的组织开发并实

^{注5} 候补项目表不仅包括在年度协议中已经达成意向的援助项目，同时包括一些对受援国的社会经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需要优先安排实施的项目。根据候补项目表，定期地对援助项目计划进行调整（即滚动计划），使援助计划的内容随时保持在最新的状态，同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财政状况的变化制定具有灵活性的援助计划。

施项目的能力，同日方建立对话型合作，日方还有必要说服中方继续努力培养精通援助业务的专业人才。

至今，直接以缩小地区间差距，解决贫困为目的的项目申请并不是很多。但是，迄今所开展的为内陆地区贫困县提供教育器材、向地方医疗单位提供医疗器械和设备等援助形式已经取得了收效。为了进一步对中国内陆地区开展援助，采取把民间无偿资金援助与青年海外合作队相结合的形式，以及加强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其它双边援助机构、非政府机构（NGO）等以直接为贫困的人们提供有效帮助为目的开展活动的各种机构和组织的联系和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现状和课题

1、中国社会经济开发的现状

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不稳定因素

回顾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 20 年的发展历程，在经济增长的高峰和低谷的反复循环中，平均增长率仍旧接近于 10%，特别是在 1992 年邓小平先生“南巡讲话”之后，出现了极为快速的增长。其后由于实行了经济紧缩政策，宏观经济的发展逐步驱于稳定，表面上看去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但是，在中国仍然存在着影响经济软着陆的“不稳定因素”。

宏观控制机能尚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主要依靠紧缩政策、特别是依靠总量控制（贷款限额管理）来维持。并且物价也是靠着部分产品的生产过剩来维系稳定的，潜在的通货膨胀因素仍然存在。因此，从 1998 年放开总量控制以后，宏观控制机能就显得越发的的重要。

在财政方面，由于 GDP 中国家财政所占的比例下降，国民经济中的财政机能萎缩，导致国家在解决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而造成的财政收入滑坡和为弥补企业亏损及发放价格补助而出现的财政赤字时显得力不从心。

在金融方面，国有企业尚不能完全摆脱对商业银行的依赖，企业不能从财政上得到资金就纷纷转向从金融机构融资。由此引发出“金融财政化”现象，结果使各金融机构都积累了大量的不良债权。

在当前这样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形成了面对这种经济变动，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不能有效推行的困难的状况。

可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

中国社会经济现状中的第二个问题是，目前支撑着中国经济主要部分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十分令人堪忧。并且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三项主要内容——企业的股份制、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改革进展迟缓（1998 年 3 月全国人大召开以后，中央各部委实行整改，取消了原有的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将其编为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各局，另外将原电子工业部和邮电部合并为信息产业部）。

在这一形势的背后，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承担着对经济实行调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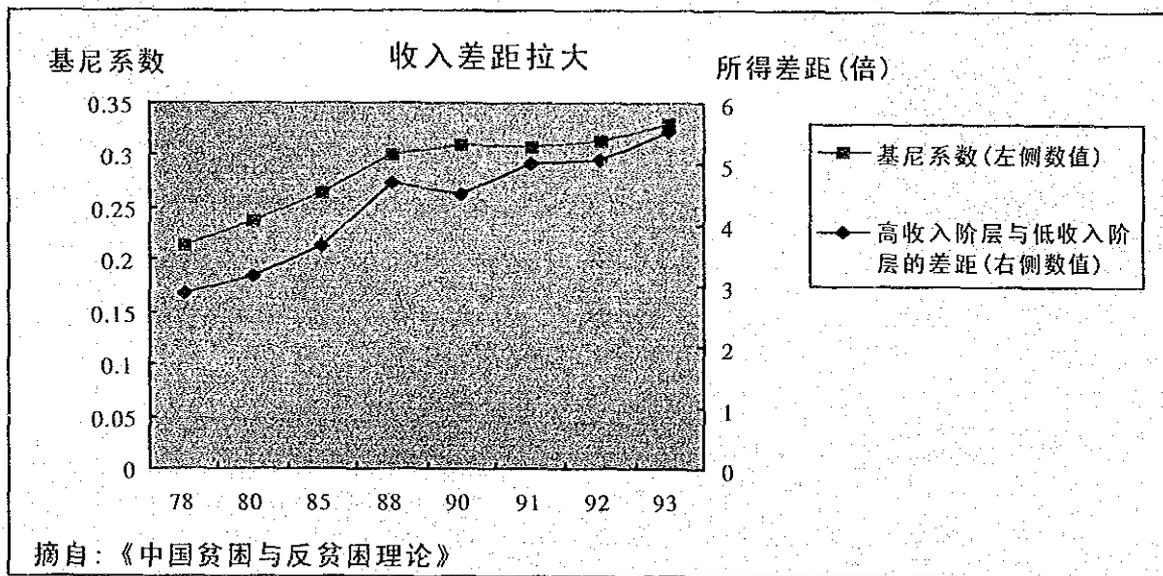
使命。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制约市场经济化的因素。比如非公有制经济尽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宪法上对保护私有财产仍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国有企业沉重的债务负担、企业剩余人员的安置、社会保障制度跟不上、以及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既得权益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诸多问题。

贫困现象和地区差异明显扩大

在第一次研究会的报告中，曾就经济发展所带来地区间差距加大的问题提出了建议。随着后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间和城市与农村间的两种收入的差距。

地区间的差距，曾经一度出现过缩小的势头，但其后又开始扩大，并且这次扩大后看不到缩小的趋势，一直保持着所谓的“差距的高位静止”状态。另外根据中国公开发表的数字，1997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为5,000万人，但是如果以世界银行制定的每天1美元作为贫困线标准的话，估计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将占到人口总数的28%（大约为3.5亿人）。另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出现了大批职工“下岗”，城市和农村失业人口增加也相对地扩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差距，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原因。

图2-1 收入差距拉大



对社会方面的投入尚不够充分

作为与贫困和地区间差距增大有着密切关系的问题，中国还存在着诸如医疗保健、教育、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妇女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却一直没有跟上。结果，造成地区间差距的增大这一状况。

在医疗保健方面，过去 20 年间，中国每年的医疗经费总额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3%^{注 1} 左右，考虑到人口增加的因素，绝对数额仍旧偏小。政府和国有企业下属的医院占用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但对这些医疗资源的运用却未必十分有效。另外，由于财政制度的僵化，对内陆地区的医疗预算分配不足也加大了内陆和沿海地区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地区差距，这种差距已经从一系列的健康水平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而且婴儿死亡率没有太大的改进，产妇死亡率仍旧很高。

在教育方面的地区间差距也十分明显。地处西北、西南的 9 个省和自治区（新疆、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西藏、广西、云南、贵州）的教育水平落后，并且使数量的急剧增加与质量保证之间的矛盾更加显著。这是随着市场经济化的进展和一些限制的放宽，各学校之间财政状况出现差距，而且由于收取学费，致使特困生的失学率上升而导致的。

农产品的长期需求存在着不稳定因素

从 95 年至 96 年，中国的粮食短缺问题在国际上受到议论。现在中国已经基本达到小康状态，并且 97 年粮食生产确保了 5 亿吨的水平。但是在中国的农业领域，粮食的生产和供给仍然不稳定，尤其是短期、中期的生产起伏波动较大，这使得中国粮食的进出口规模动荡不定，给国际农产品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可利用的耕地面积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为建造工业开发区转用农田、无秩序地使用土地的现象也日趋严重。

农业生产力与非农业生产力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加大。尽管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试图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来缩小这种生产力上的差距，但从今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角度来考虑，恐怕中国能够真正地对农业实施保护的余地并不会很大。

环境恶化、能源短缺、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仍很严重

第一次研究会提出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随着 85 年以后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1995 年中国的煤炭产量达到 13 亿吨，居全世界第一位。煤炭用量大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 75%，并且中国的煤炭一般含硫成分较高，再加上褐煤和泥煤的使用，造成了二氧化硫和煤烟的大量排放。不仅如此，工厂设备陈旧，

^{注 1} 摘自:World Bank(1997)《China 2020 Financing Health Care :Issues and Options for China》

Box1. 中国加入世界经贸组织问题

中国在 1986 年正式提出了复关 (GATT) 申请。其后, 为了争取取得世贸组织 (WTO 95 年 1 月成立) 创始国的地位, 中国从 90 年代初开始加快了复关谈判的进程。92~94 年, 中国连续 3 年降低了进口关税, 减少了进口许可证科目, 取消了进口调节税 (92 年), 并于 94 年 1 月统一了人民币汇率。通过以上措施, 中国的平均关税由 1991 年的 42.5% 降低到了 95 年的 35.9%, 92 年时中国 1247 项税目受进口配额或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的限制, 到了 97 年已经被减少到了 384 项。但是, 在以“发达国家”的身份还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复关的问题上, 中国与美国没有达成妥协, 另外, 围绕着针对急剧增加的进口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条款标准问题, 与欧洲各国及日本之间的分歧也未能解决, 结果在 94 年底中国没能复关。

对于复关谈判进展缓慢, 及可能是由于在国内要花费调整复关条件的代价太高, 中国在 94 年以后对复关显示出了明显的消极态度。其后, 在 95、96 两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亚佩克) 上, 中国做出了在 2000 年以前将平均关税降低到 15% 的承诺, 并通过 96、97 年两次降低关税, 使平均关税从 95 年的 35.9% 降低到 17%。通过参加亚佩克, 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得到了发展。可是, 与美国、欧洲各国以及日本之间的分歧仍旧没有解决, 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被推迟到 1999 年以后。

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积极影响, 中国将可以充分享受贸易自由化的好处。通过进口和引进直接投资可以提高国内企业效率, 同时可以不受歧视性限制而扩大出口贸易, 特别是美国将因此而自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另外,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中的纺织品及服装协定 (ATC), 可以使纺织品及服装贸易自由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 而多国纤维协定 (MFA) 的贸易限制使中国的这一优势在除日本以外的其它发达国家中都受到了制约。如果今后 ATC 能逐步取代并最终废止 MFA 的话, 中国对美国及欧洲的纺织品出口将会有大幅度的增加。据我们估算, 由此, 中国纺织品的出口额将是 1996 年的 1.9 倍, 约为 310 亿美元, 总出口额比 96 年将增长 21%。

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进一步降低关税, 并实行贸易自由化的话, 由于进口商品价格降低, 进口量

的增加还将会带来物价水平回落, 出口竞争力增强的效果。因此有看法认为加入世贸组织, 实行贸易自由化将使中国 2005 年的贸易额增长 50~60%。

但是, 1998 年中国进口贸易中 71% 为委托加工等免征进口关税的贸易, 对这部分而言, 加入世贸组织实行贸易自由化将不能带来贸易增长的效果。另外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中的 59% 属于用免税进口的零件、材料组装后再出口的来料加工产品, 这对贸易自由化也产生不了什么影响。降低关税可扩大的贸易应该是征收关税的一般贸易, 但根据我们对 1992 年以后, 也就是中国开始为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而降低关税的这段时期进行的匡算, 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 因关税下降而产生的一般贸易的扩大都不明显。

关税下降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这里而走私现象严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98 年以后, 中国政府加强了打击走私的力度, 如果能够真正地杜绝走私现象, 那么降低关税多少还是会带来一定的扩大进口贸易的效果。

根据以上分析, 通过加入世贸组织, 扩大纺织品出口, 使出口贸易总额增加两成的目标应该说是能够实现的。至于其它的进出口贸易能有多大的增长效果, 则完全要视中国的政策动向而定了。

加入世贸组织将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 中国的各个行业将直接面对进口商品和外资的竞争, 将会有更严峻的机构精简及其变革。预计服务行业将受到比制造业更加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在此之前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国内外竞争的考验, 而金融、保险、对外贸易、商业等领域的改革还远没有跟上。同时还涉及到庞大的劳动就业问题, 调整所需要的费用将相当可观。但另一方面, 企业受到外部竞争的威胁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反倒会带来某些积极的效果。国民经济整体的费用, 归根结底就是再就业和企业重组所必需的调整的代价。这种代价本来就是中国在市场经济化过程中必须付出的。

在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 中国应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就是作为亚佩克成员国承诺降低关税, 并提前实施。我们认为: 与其向中国提出过高的加盟条件, 不如让中国及早加入世贸组织, 并承担作为加盟国的责任, 使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做法更为有效。总之, 长达 12 年之久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应该到了收场的时候了。

由于资金不足又不能及时安装高性能的集尘装置、脱硫装置等防止公害发生的设施，使得大气污染情况日益严重。与此同时，随着都市化和市场经济化的加快，河流、湖泊、海洋污染以及城市垃圾处理等问题也越来越深刻。

关于基础设施、能源供给的“瓶颈效应”前面已经反复提到了，公路、铁路、电力等一直紧缺问题处于严重状况。比如由于煤炭的产地与消费地相隔甚远，加强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仍将是一个重要课题。石油进口量的增加也在所难免。另外，由于电力资源长期紧张，估计中国今后对于水电、核电的需求还将会增加。在开发能源的同时，中国必须对环境和生态的平衡加以足够的考虑，这也对中国行政机构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开发的课题

建立制度化的市场经济非常重要

正如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所反映的那样，为了消除宏观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维持稳定增长，建立制度化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中国当前最为紧要的课题。因此，由中央政府创造一个能够保障中立的、客观的进行宏观调控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推进行政机构改革使之与市场经济化相适应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完善为统一市场的金融系统、信息通讯、交通运输、流通环节等的基础设施，以及健全统计机构。

另外，在与中国经济整体结构调整的关系上，应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缩小地区间差距以及帮助地方完善基础设施等各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要及时改变发展模式，探索出一个注重环境和资源条件制约的市场体系。

在财政方面，如何构筑起一个有效的税收系统、并改建成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体制，如何提高税务部门的工作效率，怎样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为“分税制”定位，这些都是财政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金融方面，面临着如何建立并完善必要的环境和条件，使人民银行能够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央银行所应有的金融职能并逐步取代目前实行的总量控制手段，如何以发展金融市场为目标，充实短期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如何在商业银行中引进竞争机制，使金融更好地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等一系列的课题。

Box2. 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影响

曾经有看法认为，1997年首先起源于泰国并随后蔓延到亚洲各国的货币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会产生波及影响，还有人认为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在1994年1月大幅度降低了人民币的汇率，这次，为了挽回因亚洲各国货币贬值而失去的出口市场，中国还将再次降低人民币汇率，从而还将再次引发亚洲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风波。

但是，由于从1990年时开始，中国沿海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与东南亚各国的差距已经扩大到了2~4倍，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对东南亚各国来说，除了采取货币贬值的方法遏止出口萎缩以外，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宏观的紧缩政策限制进口以改善其经常收支。因此认为94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导致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看法是不准确的。截止到98年8月以前，中国反复表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态度。并且中国并没有象人们预料的那样失

去了出口市场，相反97年和98年第一季度的出口额还分别增长了21%和13%。另外从有关经济指标上分析，也看不出中国有陷入货币危机的迹象。

1997年，中国的外债余额为1,334亿美元。但其中88%为长期债务，而对这些债务而言，中国目前有大约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偿还外债，并且偿债比例（Debt service ratio = 偿还债务金额占经常收支外汇收入额的比例）仅为10%左右，应该说外资一下子从中国全部撤出的事态不大可能发生。但东南亚各国和韩国货币贬值确实也给中国的出口带来相对的不利，同时亚洲货币金融危机以及日本经济的不景气，也使中国对亚洲和日本的出口贸易受到了一定影响。与其担心人民币贬值和中国发生货币危机，倒不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停滞更令人担忧。9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率已经降低到了7.2%，为了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最理想的就是能将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为此，估计中国政府今后将采取各种方式刺激内需，人们应该对其效果给予足够的关注。

必须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实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将国有资产向承担着重点产业的国有大企业集中，甚至可以认为就是将国有大企业进一步大规模化。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相关的产业结构调整，具体说就是农业、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第三产业建设的加强、以及企业组织结构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将势在必行。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出现了如何安置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如何建立再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起相应的体制，减轻过去由企业包揽的各种社会负担，将这些社会负担改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

另外，处理国有企业长期积累下来的债务、严格控制新债务的产生，对新上项目，要求实施主体必须落实资本金等也非常重要。除此之外，巩固经营资源、加强人员培训，使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树立起很强的效益观念，这些都是国有企业改革今后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Box3. 关于“下岗”问题

所谓失业，一般是指人们有求职的意向但却没有就职的机会。而“下岗”则是指由于国有企业倒闭或者生产线开工不足，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让职工暂时回家，等待情况好转后再回原单位工作的情况。但实际上再回原单位工作几乎完全没有可能，“下岗”职工不得不另找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下岗”其实就意味着失业。在国有企业相对集中的城市地区，“下岗”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在很难掌握“下岗”职工的准确数字，但据1998年6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1997年中有1,151万职工下岗，其有80%来自国有企业。另外，1997年城市地区的社会登记失业人数为570万，社会登记失业率为3.1%，如果在这个数字上再加上1,151万人的下岗职工，则实际失业率将达到9%！与1993年4.3%的实际失业率相比，包括“下岗”职工在内的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可以说非常可观。

摘自：亚洲研究所编《World Trend》第38期（1998.9）

除此之外，中国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的高校毕业生将走上社会参加工作，还有据说总数达到1.3亿来自农村的潜在失业人口为了寻找工作而流入城市，已经使城市的就业压力达到了极限。同时，失业率的急剧上升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甚至可能会动摇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因此，妥善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当务之急。

目前，中国政府正努力开展“再就业工程”，通过在城市中设立职业介绍所、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就业的“上岗培训”、召开座谈会邀请典型人物介绍再就业的成功经验等方式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的帮助。另外，国家制定了8%的经济增长目标，由政府牵头，通过投资基础设施（铁路、公路、水利）建设，推行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同时为防止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还采取了地方乡镇城市化的方针。

消除贫困与地区间差距，促进社会领域的开发刻不容缓。

消除贫困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减少贫困人口。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在80年代中期专门成立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具体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国家又开始着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长期目标纲要》（以下简称九五计划与2010年目标）中，提出要变地区倾斜政策为地区协调发展政策，特别是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明确指定了具体的贫困县并向这些贫困县集中投入了开发资金。但是这种做法又导致了正在脱贫县与尚未脱贫县之间差距拉大的倾向。另外，作为缩小地区间差距的新举措，为了让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向内陆地区渗透，国家还决定建立若干个增长据点（包括长江经济带和七大经济区^{注2}、九大城市圈^{注3}）、振兴中西部乡镇企业、组织沿海地区省市对内陆地区省市开展支援和协作。

作为与贫困和地区发展差距密切关联的社会领域，首先在医疗保健领域，充实初级卫生保健（PHC= Primary Health care）、提高农村医务人员的素质、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等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开发课题。其次，在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的领域，充实基础教育、缩小地区间差

^{注2}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提出了“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原有的振兴地区经济的构想也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新提出了建设“七大经济区”的设想。这一设想在“九五计划”中又得以延续，提出了“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经济的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上的特点，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以现有的经济分布为基础，以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为核心，逐步形成七个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经济区域”的方针。七大经济区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岸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东南沿海经济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经济区、东北经济区、中部五省经济区以及西北经济区。（详见图2-2和表2-1）

^{注3} 详见图2-3和表2-2。

距也非常重要。另外对于农村中、小学校中存在的“乱收费”问题、城市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等等，都应该作为新的课题来加以解决。

积极地推动农业开发势在必行。

作为农业开发的重要课题，首先在硬件方面，为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并通过抓紧对保护土地计划、地域计划和土地利用计划的制定，为农业开发搭起一个基本框架。巩固农业基础、普及技术、整建信息体系是必要的。

在软件方面，为了应付市场变化，对农产品价格采取适度的保护、调整措施，同时作为市场调节的补充，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在土地利用率的降低在所难免的情况下，还应该对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等结构性政策加强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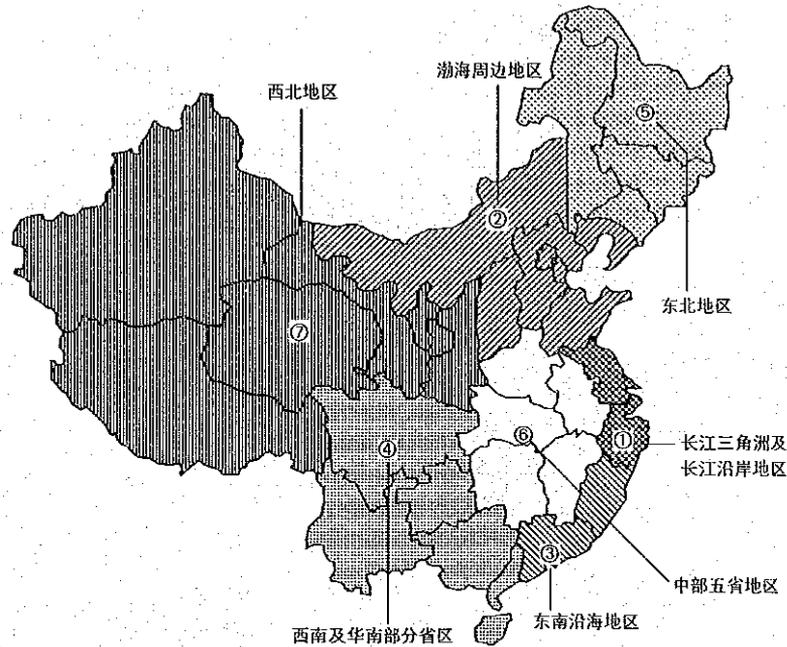
能源、基础设施的开发与环境保护必须平衡发展

在环境方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煤炭消费量、汽车的普及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必须对城市环境和公共交通的完善进行综合治理。另外在能源方面，必须通过集中供热、供电和发展城市煤气，进一步提高能源的单位利用率。

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调整各地区、各领域的优先发展顺序。另外，在国家整体的财政状况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如何筹措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估计今后对外资和民间资金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往往是一些经济效益高的项目会被优先安排，但如果从缩小地区间差距、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和提高福利的角度考虑的话，如何实现平衡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今后，一方面要努力将对环境的破坏控制在最低限度，另一方面还必须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对高效、节能和再生利用的问题给予充分的考虑。

图 2-2 七大经济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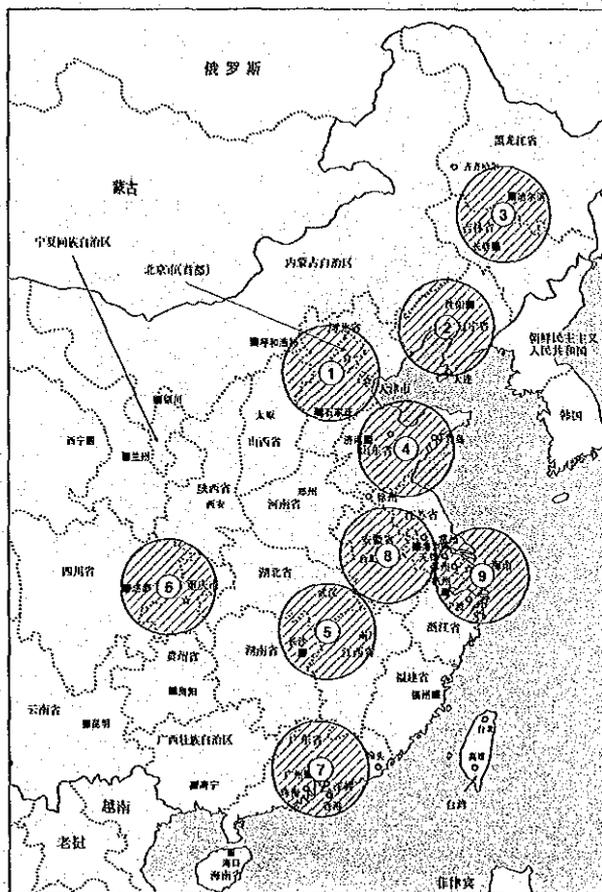
摘自：三菱综合研究所编《中国情报手册（1998年版）》

表 2-1 七大经济区

经济区名称	总人口 (亿人)	总面积 (万 km ²)	经济区的范围	GDP 占全国的 比例 (%)
①长江三角洲及 长江沿岸地区	1.68	33	东起上海西至重庆, 长江三角洲的 14 座城市(上海、江苏省的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 以及长江沿岸的 14 座城市和 8 个地区	约 20
②环渤海地区	2.4	112	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北京、天津、河北为中心, 包括河北、辽宁、山东、山西 4 省、内蒙古的 7 个盟、市以及北京、天津 2 个直辖市	约 25
③东南沿海地区	0.98	29.93	以珠江三角洲和福建东南地区为中心, 包括福建、广东 2 省	约 13
④西南及华南部 分省区	2.43	142	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海南、西藏以及广东省西部的茂名地区	约 15
⑤东北地区	1.13	124	辽宁、吉林、黑龙江 3 省及内蒙古东部 4 个盟、市	约 12
⑥中部 5 省地区	3.08	87.12	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5 省	约 19
⑦西北地区	0.8	427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5 省及内蒙古西部 3 个盟、市	约 5

摘自：三菱综合研究所编《中国情报手册（1998年版）》

图 2-3 “九大城市圈”构想



出所: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1996)

表 2-2 “九大城市圈”构想

城市圈名称	人口 (万人)	面积 (万 km ²)	人均土地 面积(m ²)	中心城市	GDP 总值 (亿美元)	人均 GDP (美元)
①北京、天津河北地区	8448	21.8	1101	北京、天津、石家庄	885	1048
②沈阳、大连地区	4067	15.0	1229	沈阳、大连	578	1421
③吉林、黑龙江地区	6246	64.0	3734	长春、哈尔滨	579	927
④济南、青岛地区	8671	15.0	1130	济南、青岛	866	999
⑤湖南、湖北、江西地区	15257	55.0	931	武汉、长沙、南昌	1030	675
⑥成都、重庆地区	11214	56.0	125	成都、重庆	624	554
⑦珠江三角洲地区	6689	17.8	628	广州、深圳、珠海	949	1418
⑧长江中下游地区	7710	15.0	934	南京、扬州、合肥	587	762
⑨大上海地区	10916	18.4	1007	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宁波、杭州	1691	1549
其它	40605	682.0	728		2287	563

摘自: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1996)

注: 在原资料中, 城市圈的名称使用的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简称, 本表做了修改。另外, 对于未能取得相关数据的城市圈, 采用一级行政区的数据代替。

2-1 社会经济开发方案

根据前面阐述的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发现状及课题，本次（第二次）研究会在对今后的对华援助的基本方针进行讨论以后，设定了一个目标年度，并对该达标年度之前的社会经济开发提出了设想。首先，目标年度为从今年（1999年）起6年以后的2005年。这6年期间包括目前正在实施的“九五计划（1996~2000）”的最后两年和现在正在草案审议阶段的“十五计划”的全程。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发在这一期间将会怎样发展？我们根据目前正在实行的《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世界银行的“China2020”报告以及有关统计数字进行推测后认为：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将达到12亿5,500万，基本能够实现到2000年将人口总数控制在13亿以内的目标，但到了目标年度的2005年时，中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3亿零152万。另外，以1990年的价格为基准推算出2000年的GDP值大约为4兆8,750亿元（人民币），到了2005年将达到6兆9,068亿元。人均GDP2000年约为3,844元，2005年将达到5,307元。

表2-3 “中国九五计划与2010年长期计划”的目标

	1995年	2000年	2010年
GNP(亿元)(1995年价格)	57,600	85,000	170,000(2000年的2倍)
增长率目标(95~2000年)	8%		
人口(万人)	121,121	不超过13亿人	不超过14亿人
粮食产量(亿吨)	4.65	4.9~5.0	
发电量(兆kwh)	1.00	1.40	
原油产量(亿吨)	1.49	1.55	
原煤产量(亿吨)	12.98	14.00	

摘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长期目标纲要

表2-4 世界银行“China2020”的预测

期 间	1985~1995	1996~2000	2001~2010	2011~2020
GDP增长率(%)	8.5(实绩)	8.4(预测)	6.9(预测)	5.5(预测)
	1995年		2020年	
人口(万人)	120,024		142,529	
平均寿命	69岁		73岁	
	1996年		2020年	
粮食产量(亿吨)	4.16		上限 6.67 下限 6.06	
粮食消费(亿吨)	4.37		上限 6.95 下限 6.95	
粮食进口(亿吨)	0.21		上限 0.28 下限 0.89	

摘自：世界银行《China2020》

表 2-5 实际值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总人口(万人)(%)	114,333	115,823	117,171	118,517	119,850	121,121	122,389	123,626
人口增长率(%)	14.39	12.98	11.60	11.45	11.21	10.55	10.42	10.06
GDP(10 亿元,名目)	1,854.8	2,161.8	2,663.8	3,463.8	4,662.2	5,826.1	6,859.4	7,477.2
GDP(10 亿元,90 年价格)	1,854.8	2,025.4	2,313.0	2,625.3	2,956.1	3,266.5	3,583.3	3,898.6
增长率(%)	3.8	9.2	14.2	13.5	12.6	10.5	9.7	8.8
贫困人口(万人)	8,500	9,400	8,000	-	-	6,500	5,700	5,000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 (ODA) 实绩(百万美元)	-	585.3	1,050.8	1,350.7	1,479.4	1,380.2	861.7	576.9

摘自：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世界银行《China2020》、ODA 白皮书等编制。

表 2-6 目标年份各项指标的设想

年	2000	2005
总人口(万人)	125,505	130,152
人口增长率(%)	0.91	0.73
GDP (10 亿元、90 年价格)	4,875.04	6,906.8
GDP 平均增长率(%)	8.0	6.9
人均 GDP (元、1990 年价格)	3,844	5,307

摘自：根据本研究会计算